

试论晚明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

刘 良 明

晚明天启,崇祯时期(1621——1644),我国的小说理论有了很大发展。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小说理论家们对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每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他们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在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发展,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晚明时期,我国的城市手工业与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萌芽。尤其是东南的苏杭地区,手工业特别发达,手工业作坊“比闾以纺织为业,机声轧轧,子夜不休。……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农村中破产的农民或在竞争中失败的手工业者,“黎明立桥以待,……什百为群,延颈而望。”^①等候雇用。史志中记载的“绛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服遍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犖万金而来,摩肩连袂,如一都会矣。”^②这些情景在小说《醒世恒言》的《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有生动的描写。

随着手工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增大、加多,市民阶层也迅速扩大。这个代表新兴力量的阶层不仅有自己的经济要求,也有着着自己的政治要求与文化要求。为了开辟自己的活动前途,他们必然鼓励与推动人们摆脱封建隶属关系的束缚,大胆地怀疑和否定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李贽就是这时期的杰出代表。他竭力抨击为腐朽封建势力服务的

程朱理学。针对他们“克己”、“存天理,去人欲”的虚伪的禁欲主义,李贽公然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③肯定了“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都是人们的正常欲望。^④他认为“个个人都是见见成成的圣人”,^⑤把圣人与一般平民在人格上平等化。主张“以人治人,则条教禁约,皆不必用。”表现了“以对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强烈向往与追求。他反对重男轻女,著文驳斥“女人短见”的谬论;主张婚姻自由,“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几乎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市民阶层的思想家都与封建传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市民阶层的思想反映在文学领域里,则是要求文学作品描写人们的真情实感。如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而“童心者,真心也。”^⑥因此,小说、戏剧这些历来不登大雅之堂而真实地描绘了普通人的寻常生活的作品便得到市民阶层的激赏。我国小说本在宋元前已缓慢演进。于宋元时期得到很大发展,至明代则渐臻成熟。天启、崇祯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优秀长篇小说已先后问世,短篇小说的搜集、整理和创作则趋于极盛,出现了“三言”、“二拍”等影响深远的小说结集。由于当时一般市民的文化比较普及,印刷出版事业进一步繁荣,这些作品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批评都积累

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资本主义的萌芽为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市民阶层的思想家对封建传统的批判和个性解放的要求则提供了思想资料；而宋元至晚明众多的小说作品又为总结小说创作经验、进行小说理论研究展示了直接对象。因之。在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比较充分、小说创作最为繁荣的东南地区，出现了成群的小说理论家，他们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如冯梦龙、凌濛初）或批评实践（如笑笑主人、金圣叹），把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极摹”与“备写”

晚明以前的古代文学理论中，诗文理论颇为丰富。它们着重对景物描写和感情抒发的探讨。而对通过情节和环境来描写人物行动的小说研究甚少，对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更少提及，万历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人们开始重视小说、戏剧的理论研究。这时的小说理论家虽然还没有提出“现实主义”这个现代语词，但他们已提出用逼真的形式来描写人情世态。这和高尔基说的“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谓之现实主义”^⑦已近乎一致。

在《古今小说叙》中，冯梦龙首先提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并肯定了“宋人通俗，谐于里耳”的好经验。“通俗”，就是“通于俗”，什么是“俗”？“俗者，含血之类，象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⑧用现代的话来说，“俗”就是形形色色的日常社会生活。因此，这里的“通俗”，除了语言形式上不用古奥的文言而用浅显的白话外，还指内容中描绘为市民阶层所熟悉的、喜闻乐见的真实社会生活图景和各阶级、阶层的面貌和它们之间的斗争。这点我们只须考察“三言”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在“三言”中，有的作品描绘青年男女的恋情（其中的主人公除前人常描写的士子与妓

女外，更多的是商人、工匠等市民阶层人物）；有的作品反映正直的官民与权奸、豪绅的斗争；有的作品叙述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生活；有的作品讴歌市民之间的友谊和信义。这些描写广阔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作品占了“三言”的极大比重。

冯梦龙的思想受李贽影响甚深，也是当时主张发展个人情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评论文学作品时，一贯很重视真实描写。他在评述自己的散曲作品时说：“子犹诸曲，绝无文采，唯一字过人，曰‘真’”。^⑨他收集、整理民歌，也是“藉以存真”，并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⑩他当然深知对于接触听众、读者更为广泛的小说来说，真实描写更为重要。与冯梦龙有密切关系的《今古奇观》的选、序者后来也指出：“墨憨斋……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⑪

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得市民阶层壮大，他们开始有了进入文学领域的要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与风流作话文。”^⑫但市民阶层的这种要求并不表现于要求建功立业、名垂竹帛，而是要将“风流”即爱情生活等“人情世态”、“悲欢离合”用小说表现出来流传后世。现实世界的生活状况如何本来就是人们所关心的最大问题；人情世态，悲欢离合更是市民日常经历见闻的主要生活内容，大量地、尽力地摹写、描绘它，必然使作品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引起人们在其中去发现和比较自身生活的状况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从而获得人们的广泛爱好。冯梦龙因此得出“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的结论。而要产生令人“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⑬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不“通俗”也是不可能办到的。

如果说冯梦龙正面论述了小说只有通俗才能“谐于里耳”，得到市民的广泛爱好。那么

睡乡居士则批评了脱离真实，“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④的不良倾向。金圣叹也指出“《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⑤即使象《西游记》那样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占主导地位的小说作品也必须植根于现实，在幻想的怪诞神奇的小说情节中曲折地重现社会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正如《二刻拍案惊奇序》里指出：“有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至于一些远离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纯粹描写鬼神怪异的奇幻，殊方绝域的传闻，“若作吞刀吐火，冬雷夏冰例观，是引人云雾，全无是处。”^⑥它们或许能暂时激起人们的兴趣，但终究不能带着人们脱离现实世界；不能引起读者对生活的深思，至多只能让读者消愁解颐于一时，而只有真实地刻划了现实社会生活的作品才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事”、“理”与“真”、“贗”

主张“极摹”与“备写”现实生活，是否等于机械地照搬与复制生活真实呢？回答是否定的。

冯梦龙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生活真实的“真”与艺术真实的“贗”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客观存在的“事”与事物本质的“理”之间的关系。在《警世通言序》中，他首先说明了小说不一定全是真事，也不全是虚构的假事；更不是去掉假事后而留下的真事，而是经过挑选的“事真而理不贗，即事贗而理亦真”。也就是说，选择的事物有叙述了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而体现了事物本质；也有的虽然是虚构的事件，然而正确地表达了事物本质。在这些作品中，“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匱石室之遗；而贗者亦必有

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第一次比较正确地说明了小说作品中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说明了“真”与“贗”都应当含蕴重大意义，反映生活的本质方面。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做到“事”、“理”相副，“真”、“贗”一致，才能“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⑦其后，睡乡居士更以绘画为例，指出“是将执画为真，则既不可，若云贗也，不已胜于真者乎？然则操觚之家，亦若是焉则已矣。”^⑧明确地肯定了作家和画家笔下的艺术真实可以胜过生活真实。这是小说理论中的一个大进步。

我国古代的小说长期与史志混杂，论者往往把小说看成是“稗史”、“野史”。而“讲史”的小说，也多泥于史实而叙述平板、呆滞，人们还常常将它们与“正史”比勘而加以非难。二十四史中，几乎都有“演义”，然而除《三国演义》外，别的“演义”很少受到读者的欢迎，就是因为史家病其疏陋而常人嫌其沉闷。冯梦龙、睡乡居士突破了传统的成见，从理论上让作家摆脱了真人真事的束缚，有了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从而大大地促进和提高了小说创作。

稍后，金圣叹更明确地提出艺术虚构在小说创作中的必要性。他说：“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⑨“以文运事”，即用文字表达已经发生的真事，必然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因此“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它可以依据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视作品的需要而合理的想象和虚构出一些人和事来，正如鲁迅指出：“……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⑩这样，在写作的时候，可以“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让作者思想和笔墨自由地纵横驰骋，当然能更集中、更普遍地反映生活真实的全貌。

机械地照搬与复制生活，绝不能算是艺术作品。只有在大量的生活素材中，选择那些能够体现生活本质内容的事件，进行合理的想象与虚构而后创造出来的作品中的艺术真实。才能比生活真实更为典型，更为生动、感人。明人能创作出那么多至今仍传播不衰的长、短篇小说作品，应该说是与他们比较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密切相关的。

“真奇”与“庸常”

小说作品既要求“极摹”与“备写”现实生活，又要求作家通过虚构而创作的作品的艺术真实胜过现实的生活真实。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晚明的小说理论也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写道：“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譎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矣。”他反对“向耳目之外索譎诡幻怪以为奇”，主张“知奇之为奇，而不如无奇之所以为奇。”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已经存在“奇”，不必到日常生活以外去寻求“奇”与其把怪异的东西当作“奇”，不如把司空见惯的东西当作“奇”。至抱瓮老人选辑《古今奇观》，笑花主人之为作序。更深入提出了“真奇”、“至奇”，明确地说：“故夫天下之真奇，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他们都非常推崇“奇”、“真奇”、“至奇”，并以“奇”名书。他们关于“奇”的论述实质上是现代文艺理论中的典型问题。

我们知道，用文学作品反映丰富的现实生活，必须把日常生活现象集中、概括起来，进行由表及里的开掘和去芜存菁的提炼，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才能“以少总多”地反映生活。正如高尔基所说，“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身上，抽出他

们最特征的阶级特点、性癖、趣味、动作、信仰和谈风等等，把这些东西抽取出来，再把他们综合在一个商人、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靠了这种手法就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②这种典型出自“庸常”又不同于“庸常”，别林斯基形象地称之为“熟悉的陌生人”。“熟悉”在于他取自人人耳闻目睹的真实的“庸常”生活；“陌生”则因为他经过了典型概括，已不是任何人耳闻目睹过的“真奇”的新人。这种典型使读者通过个别看到事物的一般；透过形象看到现实生活的本质，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庸常”中，总结出惊心动魄的社会真理并以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因此使人惊醒，令人感奋。发人深思，这种典型才是“真奇”、“至奇”。

其后，金圣叹更进一步阐述了典型人物的特征。他指出：“《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③“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④然而又“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相识。”已这和恩格斯说的“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说的。是一个‘这个’”^⑤几乎一致了。

如果说真实描写（或“细节的真实”）是现实主义起码要求的话，那么，成熟阶段的现实主义（或“充分的现实主义”）则要求在叙事文学中“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晚明的一些小说作品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了这个要求，当时的小说理论家通过对作品的批评实践也朦胧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当时达到“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作品毕竟不多，而现实主义的理论也处于幼稚阶段。因此，他们只能联系作品的实际作出形象的说明，而不可能作出完整、周密的科学表述，——对现实主义作出科学表述还有待创作更加发展，理论更加完善的现代才有可能。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古代的文学理论家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也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格物”与“物格”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要求塑造概括了某一阶级或阶层的本质，又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晚明的小说理论对如何达到以上要求也提出了一些好见解。

金圣叹指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读《水浒》，其为人已绰绰有余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一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数声，斯不免再映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②此文前段赞赏《水浒》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典型形象以后，紧接着谈到了塑造典型的难处：一手画数面，一口吹数声，难免雷同。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弊端，做到“各自入妙”呢？金圣叹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十年格物”说。

按“格物”初见于《礼记·大学》。据东汉郑玄注云：“格，来也，物，犹事也”。南宋朱熹对此有所发挥：“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③明代左派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王艮对“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吾身对上下前后左右是物”^④清人陈沚说得更明白：“格物但当训为至事，至事者犹言亲历其事也。天下之大，古今之远，不能亲历，读书即无异亲历也。故格物者，兼读书阅历言之也。”^⑤这里的“穷至事物之理”、“亲历”、“阅历”“上下前后左右”之物运用到文学创作领域来。就是要求作家长期深入社会生活、观察社会生活，然后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把握住社会生活的本质、达到“一朝物格”的境界，这时才能选取既富有个性特征又概括了一定社会生活本质的事件来进行创作。“……物格夫然后能

尽人之性。”^⑥即“物格”以后才能了解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时才能得心应手，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也；其忽然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写一淫妇，即居然淫妇。”^⑦当然，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然后进入塑造典型形象的创作过程。即从“十年格物”到“一朝物格”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必须费尽心血、惨淡经营，正如金圣叹指出的：“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

晚明的理论家因为所处阶级地位及当时生产力的限制，他们提出的“格物”和我们现在的深入生活与认识生活当然有本质不同，但比之前人，则有了重大进步。

唐代文人创作传奇，是因为“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⑧它虽比六朝人志怪与志人小说前进了一大步，但仍较少以日常生活为题材，而且着眼点主要是“奇”，所以是否深入生活对创作的影响并不很大，宋代的小说理论更多地号召向传统学习、向书本学习，“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功历代史书。”^⑨《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⑩学习传统和书本是重要的，然而它们只是小说创作的流而不是源。只有现实的社会生活，才是小说创作唯一最丰富的源泉。晚明小说创作的繁荣，小说作品中体现的强烈现实主义精神，应该说是与他们认识到创作小说必须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分不开的。

从天启初年起，“三言”、“二拍”陆续问世，至崇祯十四年（1641）金圣叹评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出版，这短暂的二十年时间里，

（下第84页）

- ⑬ 《周易正义》卷九。
 ⑭ 李镜池《周易探源》第321页。
 ⑰ 《说卦传》记载了八卦的象可象征多种事物，《巽》卦的基本卦象是象征风，又可象征木。
 ⑱ 《象传上》有时以下卦为内卦，以上卦为外卦。
 ⑲ 《周易正义》卷四。
 ⑳㉑ 《毛诗正义》卷一。
 ㉒㉓ 《毛诗正义》卷八。
 ㉔ 钱钟书《管锥篇》第1册11页。
 ㉕ 陈骥《文则》卷丙上。
 ㉖㉗ 《毛诗正义》卷十一。
 ㉘ 《春秋左传》五十一卷一卷五十一。
 ㉙ 欧阳修《易童子问》卷三。
 ㉚ 李镜池《周易探源》312页。
 ㉛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五。
 ㉜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六。
 ㉝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6页。
 ㉞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188页。

- ㉟ 《史记》卷八十四。
 ㊱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601页。
 ㊲ 《礼记注疏》卷五十二。
 ㊳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108页。
 ㊴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㊵ 《西方文论选》上册52页。
 ㊶ 《礼记注疏》36卷。
 ㊷ 陈应行《吟窗杂录》。
 ㊸ 《宛陵先生集》卷二十七。
 ㊹ 《宋诗话辑佚》卷上963页。
 ㊺ 《姜斋诗话·诗译》。
 ㊻㊼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第493、499页。
 ㊽ 《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彧传》。
 ㊾ 皎然《诗式》。
 ㊿ 《刘禹锡集》173页。
 ① 司空图《与极浦书》。

(上接97页)

小说理论的发展迅速而完善；研究的问题广泛而深入。在现实主义的许多重要领域里，如真实地描写社会现实生活；正确认识与处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如何塑造典型形象等方面，晚明的小说理论都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并对当时及后世的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是古代文学理论中一个极其珍贵的组成部分。认真地整理和阐释它，必将为我们当前的小说理论研究及小说作品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 ② 《明儒学案》卷六十。
 ③ 李贽《焚书·童心说》。
 ④㉑ 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
 ⑤ (汉)应劭《风俗通义序》。
 ⑥ 冯梦龙《太霞新奏》卷十。
 ⑦ 冯梦龙《叙山歌》。
 ⑧㉒ 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
 ⑨ 《醒世恒言·黄秀才微灵玉马坠》。
 ⑩ 冯梦龙《古今小说叙》。
 ⑪㉓ 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
 ⑫㉔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⑬ 冯梦龙《警世通言序》。
 ⑭ 鲁迅《给徐懋庸》。
 ⑮㉕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序三》。
 ⑯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
 ⑰ 朱熹《四书集注》。
 ⑱ 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答问补遗》。
 ⑲ 陈洋《东塾读书记》。
 ⑳ 《第五才子书》五十五回总批。
 ㉑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
 ㉒ (宋)罗烨《醉翁谈录》。

- ①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郭·风俗考》。
 ② 康熙二十三年《吴江县志·物产》。
 ③ 李贽《焚书·答邓石阳》。
 ④ 李贽《焚书·答邓明府》。